

「客約紐」名——實事飾粉

暴風的評批發引家作

譯 華 新 黃

記者經常要費盡心血，尋求切中核心的奇聞秘辛和引句來撰寫報導。有時候，他們會受誘走捷徑，將素材加油添醋一番，把讀者帶入精心編織的人物、五光十色的情境或捏造的引人談話當中，像這些虛構的添加物，不管他們口口聲聲說是記者觀察而來的精髓，其實都是違背了新聞專業倫理。

所以，當五十八歲的「紐約客」作家阿拉斯德·雷德前些時承認，他曾經反覆地使用上述手法來寫作，因而引起一場引人注目的批評風暴，也招來素負盛名和一向謹慎的「紐約客」的一番辯護。該雜誌的編輯威廉·蕭恩如是說：「他只是依我們的規則犯一點新聞上的錯誤，並沒有傷害任何人，也沒什麼大不了的，這麼做純為文學上的理由。」

雷德巧妙「傑作」的細節，曾源源本本披露在「華爾街日報」上。撰稿的記者瓊安·李普曼，是雷德一九八三年在耶魯大學暑期班講授「文藝法規與倫理」時班上的學生。其後，經過李普曼和一名紐約時報記者多次的追訪，雷德才開始認帳，坦承他會渲染報導的背景資料，甚至杜撰人物和對話。

不久前，雷德告訴時代周刊的記者，他久已認為這種「創作」是「一種錯誤，不登大雅之堂」，而且他「不打算一輩子靠此為生」。他解釋他為何把這種過失在耶魯大學的課堂上透露，「這種事可能會發生在你身上而我已做了——我絕不強加袒護。」他並不排除他還會依樣用這種技巧來寫作的可能。但他說：「萬一麻煩又來，我勢必會嘗到苦果，而且所做的都會完蛋。」

變化事實以企求戲劇性的描寫，可說是「新新聞學」的遺澤，這種寫作方式在六〇、七〇年代的雜誌和書籍上曾風行一時，近來則一再招人疵議。「新新聞學」作家可能把報導的人物改頭換面，並憑空創造出一些場景。有時還會以第三者而非當事人的訪問記錄做基準，重新組合事件發生的次序，甚至還聲稱他們知道人們在想什麼。

柯雷·費克在經營「紐約」雜誌時，曾把編輯蓋爾·西希附在一篇文章中的說明——妓女蕾本絲一角純屬虛構——予以刪除。理由是：「我想這會使故事失去趣味。」他對這種誤導讀者的做法頗為後悔。

讀者並質疑大衛·麥克柯林在一九八三年揭發好萊塢隱私的作品「低級的暴露」(Indecent Exposure)，以及由唐·考威特所寫已在今春出版，曾由哥倫比亞電視網拍成記錄片，描寫威廉·魏摩蘭將軍生平的調查報導——「榮譽之事」(A Matter of Honor)，兩者都重新編構了對話。

而「華盛頓郵報」的兩名記者鮑伯·伍德華和卡爾·伯恩斯坦在那本揭露尼克森「水門事件」的「白宮末日記」(The Final Days)一書中，也使用未具名的消息來源以重構白宮內部



的景況。但是伍德華另一本有關喜劇演員約翰·欠路西的書「網路」(Wired)，卻是逐章逐節，指明消息來源出處。

自一九五九年即成爲「紐約客」作家的雷德，承認他有五次寫作，也許還包括其他次，曾經修飾過事實。其中最引起非議的一次，是雷德在「巴塞隆納的來信」當中，描寫西班牙人坐在「窄小，蒼蠅滿佈的酒吧中」，公開嘲弄那時獨裁者佛朗哥的電視演說。事實上，電視播放演說當時，那間酒吧根本不存在，而雷德正端坐在一度是個酒

其他雷德所承認的錯誤較不嚴重。在一九七六年的一篇有關西班牙一個沒落村鎮的報導中，他把該村鎮的「明確性」從描寫中隱去，以保護該村鎮的「隱密性」。「紐約客」編輯蕭恩說，這樣一來，這個小村鎮卻易讓人認爲是「杜撰的」。在一九八二年一篇寄自西班牙的記事中，雷德修飾了他在一次的特別旅途中和一個未具名計程車司機的談話。儘管他承認他不知道有這一談話會發生，因爲他的筆記「並沒有記載日期」。

「紐約客」有「市談欄」(The Talk of the Town)，是一篇簡短的，摘要性，類似社論性的報導。雷德曾在此描寫他兒子在耶魯大學的一九八二年級畢業典禮，卻聲稱是以「一個來自鄉下的老朋友」的角度參加姪孫女的畢業盛禮。他並以同樣的虛構人物和對話，報導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米諾效在紐約大學的演講。雷德的解釋是：用一個虛構的角色可以幫助他克服作家的瓶頸。例如「人稱」——「我們那個史坦利」，或是「假名」——「鐵路工人」E·M·傅林波」等等，都是「市談欄」裏司空見慣的設計。

通常記者們都同意，扼要地歸納受訪者的談話或修改一下他們的文法，是可以接受的，只要不扭曲原意就好。但是「洛山磯時報」的編輯威廉·湯瑪斯卻說，如果記者像雷德那樣做，他會把他們解聘，「這種放縱的事，幹我們這一行的可不成。」「華盛頓郵報」的執行編輯李歐納·唐尼說：「夾在對雷德的個人信任和對雜誌的精確標準中，蕭恩顯然是兩邊都爲難。」「第蒙記事報」總裁麥可·甘特納說：「假如不必處理事實，任何人都可以成爲好記者。」

就批評者而言，雷德對事實的偏離並非微不足道，毫無關係。任何對事實的違反，都是朝向不可信，滑落斜坡的第一步。事實乃基於人們所同意，而真實則爲每一讀者所決定。(譯自時代雜誌)

保所住過的家中，觀看佛朗哥的電視演說。此外，該篇文章中的兩個主要人物是編造的，某些應該是西班牙人意見的地方，卻成了雷德自發的議論。

雷德告訴「華爾街日報」說：「不管酒吧是否存在，這和我在報導中所追求的毫不相干，假如有人要寫有關西班牙的題材，事實並不能給你什麼。」他並告訴「紐約時報」的記者說：他只是尋找「更大的實體」來配合他觀察到的「真實」。後來他又說，他這麼做的一個主要動機是保護他的消息來源，但他承認他可以做到如此而不必粉飾事件的背景。

